

公元前十世纪中国东北地区牧业生活方式的兴起

——区域文化的发展及其与周邻地区的互动

吉迪

(以色列 希伯来大学 东亚研究院)

张玲 余静 译 滕铭予 校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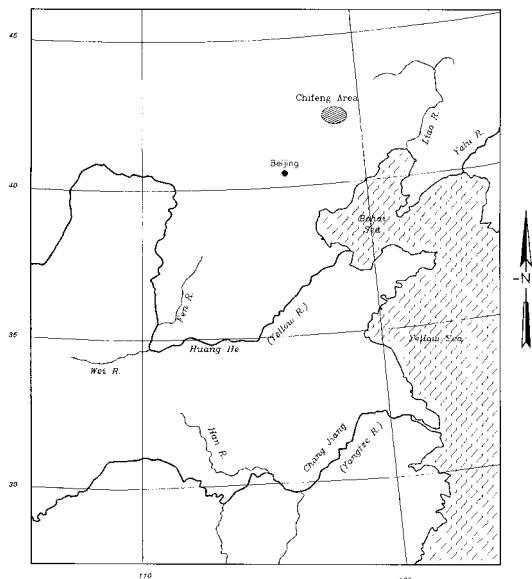
摘要: 本文重点研究两个现象: 1, 中国东北边疆地区游牧民族社会和经济的发生发展过程。2, 该地区文化和周邻地区——西伯利亚、东欧、中国北方地区的文化间日益加强的交互作用。这些表面上毫无联系的内容实际上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且对此后 2500 年间该地区区域政治环境的形成起重要作用。只有通过对这两个过程的研究我们才有望获得对宏大历史背景的更好理解。

关键词: 游牧文化; 中国北方地区; 欧亚草原; 区域互动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本文重点研究公元前二世纪末期和一世纪的前半期在赤峰地区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图一)。这一时期, 在被中国考古学家称之为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我们发现了最早的东北地区游牧文化的迹象。与存在于公元前 3 千纪晚期到公元前 2 千纪早期的夏家店下层农耕文化相比, 可以观察到地区间强烈的互动对生计方式转变的重要意义。



图一 中国东北地区及赤峰地区位置图

比较该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两个阶段关于社会文化的基本问题和社会政治经济进程, 两个阶段不同的物质遗存能告诉我们哪些有关它们的创造者及创造者所处社会的信息? 为什么二者不同, 变化是如何产生的? 这些差异的产生是否与居民人种构成及外

来移民迁入有关？它是否反映游牧生业方式的转变和为什么牧业在公元前一千纪获得了重要地位？

我认为与其寻找气候变化或者外部影响等决定因素，不如试图解释土著居民作出选择的原因。这些选择与经济适应和不同社会基本框架的相互作用有关。向牧业社会转变，与经济领域同步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和新的文化间相互关系的确立。

1 考古学上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

中国东北地区农业的发展与黄河流域同时^[1]。公元前 7 千纪末，农业村落在这里普遍存在。从这些被称为兴隆洼文化的早期农业村落中发展出一系列可以辨识的具有土著性质的农业社会。虽然外部影响无法排除，但是似乎本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是主导因素。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公元前 3 千纪晚期至公元前 2 千纪上半叶达到鼎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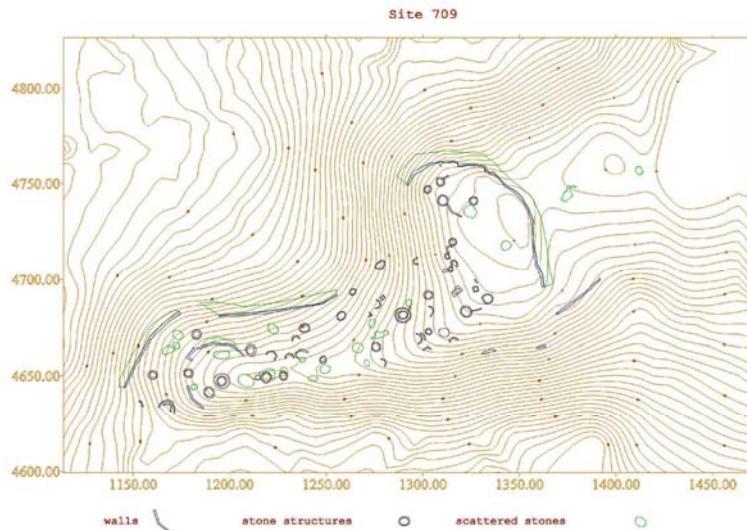
夏家店下层文化在本地区的发展序列中形成一个很有戏剧性的高峰。这一时期具有一些显著的特征，如遗址数量剧增、规模变大，该地区第一次出现大规模的公共建筑^[2]。夏家店下层文化集中分布在赤峰地区，该文化的遗存在西拉木伦河以南、燕山南麓以北、医巫闾山以西、伊河以东都有发现。

在前几年我与同事合作进行的赤峰地区区域性考古调查中，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呈现出一个很明显的人口剧增迹象^{[2][3][4][5]}。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单个的夏家店文化遗址分布最大可达 23 公顷，可以识别出几个大的遗址群，它们比各自独立的遗址点更能反映具有社会意义的聚落面貌。这些遗址群密集分布于较低的台地上，俯瞰大片的农田与谷地。他们与丘陵地带的位于小山顶的防御工事有着松散的联系（图二）。

坚固防御系统的建立是这一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的典型特征。这些系统包括坚固的石墙，有的达 10 米宽。在大型遗址的防御系统中通常包括建壕沟两侧的双层围墙、有些甚至有半圆形的“瞭望台”（图三）^{[2][6]}。拥有这些防御系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房址分布在围墙之内，但是对于它们的布局尚不清楚。这一时期的建筑以石头为主要建筑材料，兼有土坯^{[6][7][8][9][10][11][12]}，这些房址多数是半地穴式的，兼用石头和泥砖。



图二 夏家店下层文化山顶防御工事（参见[68]p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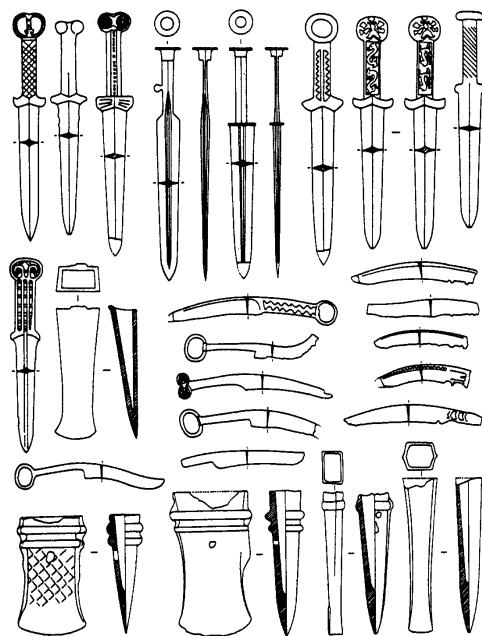
图三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平面图

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转变在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中表现出戏剧性的变化。通过初步的观察可以得出如下认识：4000 多年的社会政治体制的渐进突然中断了。夏家店下层文化阶段的三级中心聚落全部消失，而夏家店上层文化没有发现坚固的防御工事。对于夏家店上层遗址有限的发掘未能找出大规模的公共建筑。比如在夏家店遗址和南山根遗址发现了少量的单个建筑和窖穴遗址。夏家店上层的建筑是用土坯和一些容易腐烂的原料建成的半地穴式或地上式房屋。这些房址直径 2.5-4 米，在居住面上有明显的柱洞和残留有灰烬的灶的痕迹^{[10][13]}。即使是这样的房址也很少见到。大部分的夏家店上层遗址房址比较少，甚至完全找不到，灰坑比较多^{[10][13][14]}。和夏家店下层相比，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陶器质量较差，陶容器的烧成温度或许比较低，陶器质地柔软易碎且颜色不太均匀。^[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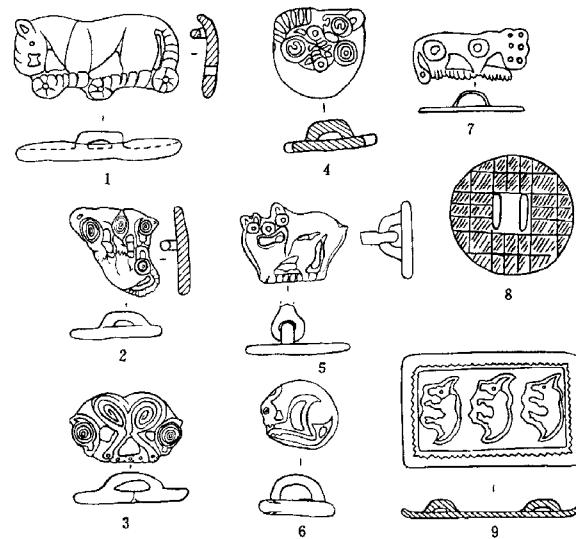
这些信息为通常所认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一个趋于简单的社会提供了有力证据，而其他方面的信息则导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陶器质量急剧下降的同时，铜器生产表现出空前的繁荣。和夏家店下层遗址里出土的毫无价值的小型铜饰品相比，已发表了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发现的大量的青铜制品。虽然有些青铜器是出自居址，但其中大多数青铜器还是出自墓葬中¹。

这些铜制品很多装饰有动物纹样并制成动物形状，这种样式有别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15][16]}。最常见的青铜器是工具、武器、马具和装饰品^{[10][13][17][18][19][20][21][22][23][24][25][26]}。典型的工具包括刀，斧和凿；最常见的武器有匕首、鎒斧和镞，（图四）。虽然发现的数量不多，但是是这一地区很有代表性的器物；常见的装饰品包括铜扣，带钩和带有卧兽图案的牌饰；（图五）还发现了当地生产的青铜容器。（图六）^{[19][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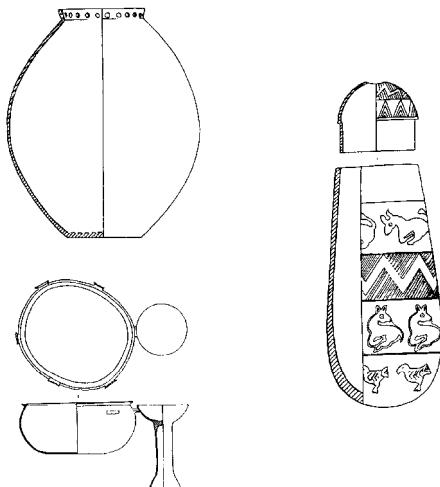
¹ 出自于夏家店上层居址的青铜器请参见[64]。



图四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刀、匕首和斧(参见[24] p46).



图五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带有动物图案的盘子和其他装饰的青铜制品(参见[19]p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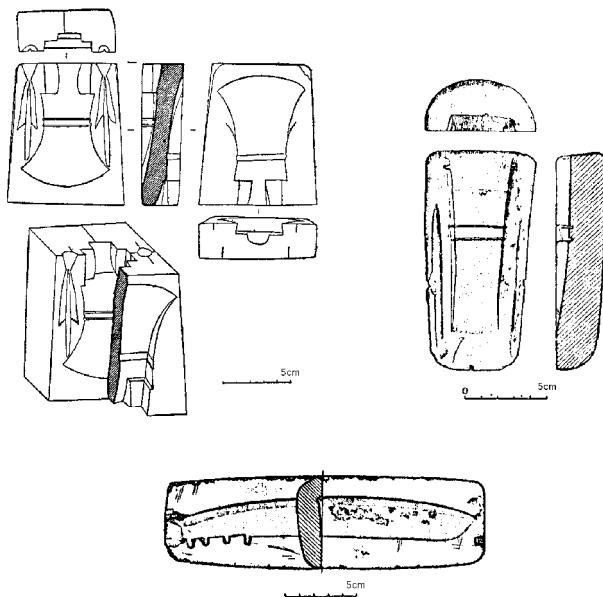


图六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容器(参见[19]p8, p19).

还没有通过化学成份分析来确认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是在当地生产的，但在墓葬和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器物，其独特的样式表明这些器物很可能是在当地生产的，而非外来传入。这些结论已被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典型器物的石范和陶范所证实。(图七) ^{[21][27]}已发现的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作坊遗址指示出当时青铜制造业的规模。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约 8 公里处的林西大井发现了一个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大型铜矿址。该遗址占地 2.5 平方公里，包括 47 个采矿坑。最大的一条长 102 米，深 8 米。在一个采矿坑中发现了典型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陶片，骨器和铜品，还有超过 1500 多件石器。^{[28][29]}在这里也发现了熔铜和铸造的场所。在这个遗址中发现了铸范的碎片表明大规模的采矿和铜器的制造在大井遗址是同时进行的。^{[21][29]}所有这些表明在中国东北地区分布着大量的青铜生产作坊和青铜制品，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器生产已经有了专门化的生产和劳动分工体系。³

² 其他许多没有发表的陶范都存放中国的博物馆中，例如，笔者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博物馆中就发现许多没有发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模子。

³ 另一个大规模发现铜器铸造的场所是牛河梁遗址。这个遗址断代为夏家店下层时期（见[65]）我认为是错误的，它应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



图七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石范(参见[30]p83; [27]p303).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埋葬习俗是研究当时社会阶层重新整合的另一个指标，在这个时期，其社会阶层的划分不仅没有淡化，很可能还有所强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墓葬是土坑石板墓，其中很多在地表都有标志，从而易于在地表调查中被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一般随葬不超过 20 件的陶容器、几件骨器和石器、殉牲（通常是猪和狗），偶然发现有一些小的青铜器^{[7][31][32][33]}。与之相比，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大墓，如在小黑石沟发掘的一座墓葬，随葬器物超过 1000 件，其中有 90 多件大型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容器共出，甚至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小型墓葬，也至少包含几件青铜器和其他随葬品。

对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墓葬各项因素数据的系统比较显示，后一时期等级制度更加严格^[34]。在考古学上，这些埋葬制度被视为与建筑墓葬和制作随葬品的劳动投入有关。因子分析的方法被用于解决在一个复合样本中发现多重联系的问题。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墓葬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见于表一和表二。表中的各列数据分别表示各项墓葬因素对不同因子所起的作用大小，即贡献率的大小，其数值越大，说明该项墓葬因素对该因子所起的作用越大，具有较大数值的墓葬因素间的关系亦较密切；若数值为 0，则表明该项墓葬因素对于该因子完全不起作用；若数值为负数，则表明该项墓葬因素对于该因子起负作用，即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同时与其他呈正值的墓葬因素之间为负相关的关系。两表的结果分别表示两个时期的墓葬中各项因素互相有联系，同时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这些联系更强且更加多样化。此外，表格的第一列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标本变异率为 30%，而夏家店上层的标本变异率为 52%。

表一 大甸子墓地夏家店下层墓葬因子分析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墓葬规模	0.839	0.287	0.004	0.054
彩陶	0.770	0.287	0.004	0.054
陶容器	0.741	0.414	-0.062	0.013
随葬品总数	0.647	-0.676	0.010	0.241
殉牲	0.629	0.398	0.111	-0.134
石制品	0.612	-0.696	0.015	0.262
贝类	0.494	-0.212	0.200	0.293
骨制品	0.446	-0.262	0.380	-0.213
石斧	0.406	0.077	0.448	-0.451
金属制品	0.379	-0.309	-0.576	-0.342
年代	0.351	0.456	-0.114	0.294
玉器	0.219	-0.148	-0.707	-0.329
纺轮	0.069	0.271	-0.384	0.558

表二 夏家店上层墓葬因子分析⁴

⁴表中数据来自[17], [19], [18], [25], [26], [24], [10], [66], [22], [23]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大型青铜器	0.945	-0.273	0.029	0.132
铜容器	0.938	-0.289	0.041	0.139
墓葬规模	0.926	0.133	-0.069	0.038
青铜工具	0.911	-0.297	0.059	0.126
全部青铜器	0.877	0.091	-0.173	0.205
金器	0.848	-0.322	0.082	0.118
青铜兵器	0.829	-0.178	-0.019	0.081
全部随葬品 s	0.658	0.662	-0.290	-0.064
石棺	0.649	0.229	0.382	-0.305
小件装饰品	0.583	0.713	-0.309	-0.070
石制品	0.435	-0.214	0.281	-0.488

□

下文将研究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的差别，并试图从三个层面进行解释：1、经济变化；2、社会和意识形态变化；3、区域间互动的变化模式及其对当地社会的影响。

2 中国东北地区牧业的起源

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中普遍存在的动物纹饰暗示该文化的创造者是游牧民族。⁵ [32] 在赤峰地区的区域性调查结果显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情况，一些遗址分布在靠近水源和耕地的地方，多叠压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之上，这表明农业仍是重要的经济资源^{[4][5]}。

与一些考古学者的观点相反^[32]，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器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存在农业活动。在调查和曾发掘过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大片的空地和农耕工具诸如锄、斧、收割工具和加工工具等，在很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储藏用的窖穴，表明当时的农业产量已经很高。已发现的窖穴数量多于房址的数量^{[10][14][35]}，因此用于定居的建筑数量减少并不意味着农业重要性的下降。

探索夏家店下层文化向上层文化转化的一个途径是比较二者的聚落形态。通过比较遗址位置，农业和畜牧资源，可耕地面积和水资源等，如遗址分布在距离饮用水源更远的地方，则可以体现经济方式的适应性转变。遗址分布变化是经济转型的敏感表现。初步观察两个时期的遗址与主要河流间的距离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通过 GIS 对我们进行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计算出这些至少包含 4 片夏家店下层或夏家店上层文化陶片的采集点距离水源（主要河流和它们的重要支流）的距离。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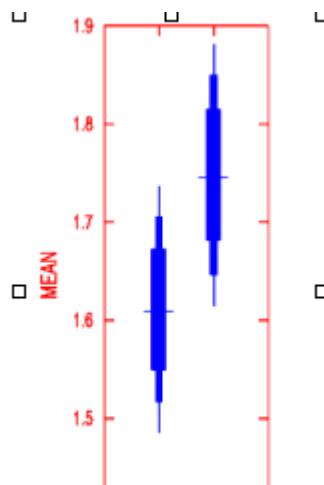
表三 夏家店下层和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距离水源的平均距离

⁵ 在 Di Cosmo, N. 的近作古代中国及其敌国：东亚历史上游牧民族势力的强大[37]中提到，这些主题体现向游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也说明很多野生动物作为狩猎对象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和很有价值的文化载体。

⁶ 在我们的调查中，每个遗址点包含至少一个采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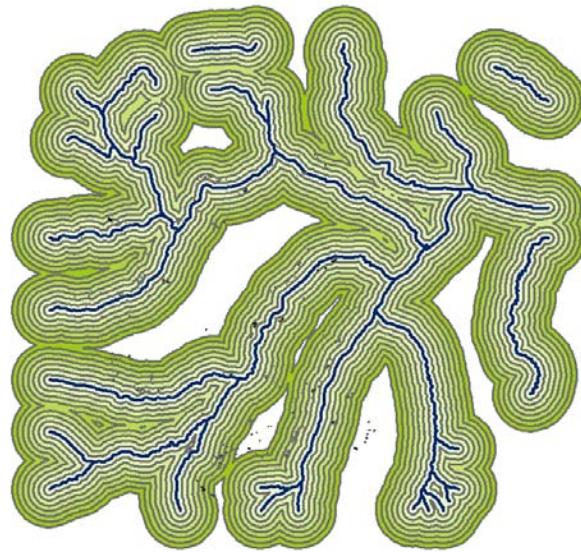
	夏家店上层	夏家店下层
采集点数量	559	557
平均距离(公里)	1.75	1.61
标准差	1.23	1.15

虽然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距河流的平均距离并没有明显远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但是，其结果在统计学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图八）。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的海拔高度明显变高，远离河流及其主要支流，这体现了对新的生态区域的开拓。与永久水源距离更远的这些区域包含的可耕地比较少，不能吸引人们定居，因此我认为这些新区域的开发可能与游牧生计方式的发展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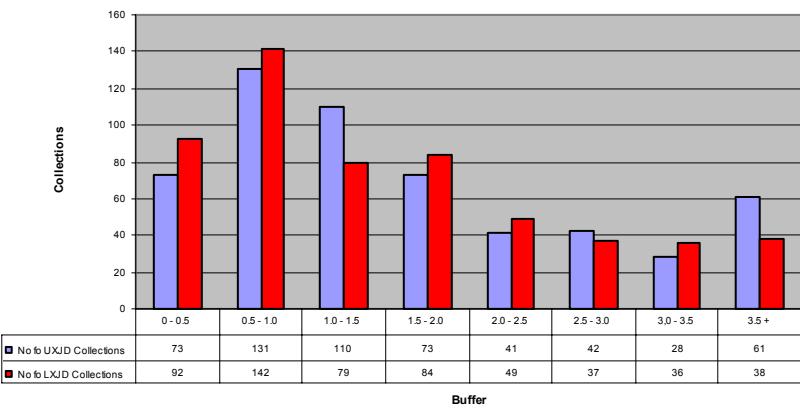
图八 夏家店下层与夏家店上层遗址到水源的平均距离比较（置信区间分别为 80%, 95% and 99%）.

研究同一调查结果的另一个途径是围绕着主要水源建立不同的缓冲区，以比较两个文化时期分布在不同缓冲区内的遗址数量和规模。以每隔 500 米的间距建立了 7 个这样的缓冲区（图九）。显然有更多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远离河流。值得注意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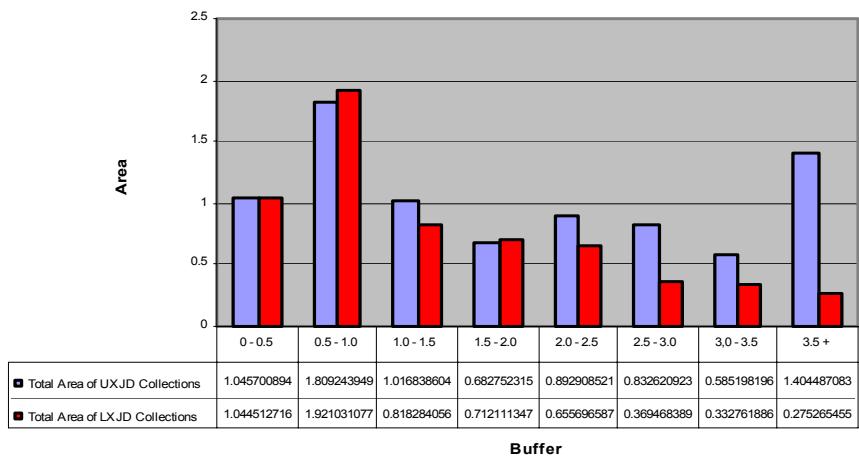


图九 赤峰调查区主要河流沿岸缓冲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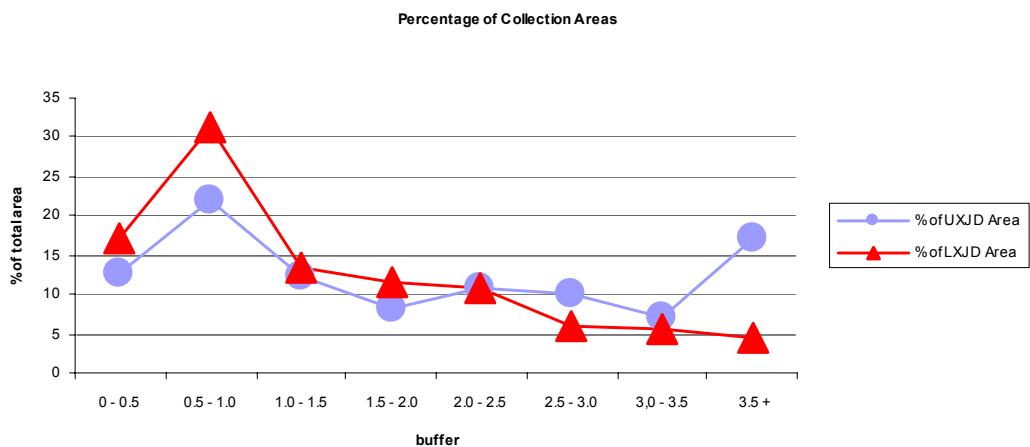
仅在第二个缓冲区内（500–1000 米）的分布出现一个峰值，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则在距水源 3500 米以上的地区出现了第二个峰值。这一现象在用采集点面积进行统计时尤其明显（图十至十二）。这一结果显示夏家店上层文化可能有农业和游牧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共存。



图十 每个缓冲区夏家店下层与上层文化采集单位数量



图十一 每个缓冲区夏家店下层与上层文化采集单位总面积



图十二 每个缓冲区夏家店下层与上层文化采集单位面积百分比

表四 不同缓冲区内夏家店下层与上层文化遗址分布比较

缓冲区 (KM)	夏家店下层文化采集点数量	夏家店下层文化采集点数量	夏家店下层文化采集点面积 (KM ²)	夏家店上层文化采集点面积 (KM ²)	占夏家店下层文化采集点的百分比	占夏家店上层文化采集点的百分比	占夏家店下层文化采集点面积的百分比	占夏家店上层文化采集点面积的百分比
0 - 0.5	92	73	1.044513	1.045701	16.5	13.1	12.6	17
0.5 - 1.0	142	131	1.921031	1.809244	25.5	23.4	21.9	31.3
1.0 - 1.5	79	110	0.818284	1.016839	14.2	19.7	12.3	13.4
1.5 -	84	73	0.712111	0.682752	15.1	13.1	8.3	11.6

2.0								
2.0 - 2.5	49	41	0.655697	0.892909	8.8	7.3	10.8	10.7
2.5 - 3.0	37	42	0.369468	0.832621	6.6	7.5	10.1	6
3.0 - 3.5	36	28	0.332762	0.585198	6.5	5	7.1	5.4
3.5 +	38	61	0.275265	1.404487	6.8	10.9	17	4.5
合计	557	559	6.129132	8.26975	100	100	99.9	99.9

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中得到的动物骨骼是畜牧业重要性增强的直接证据。尽管在夏家店下层遗址中就发现有家畜的骨骼，但是夏家店上层遗址中这类骨骼的数量剧增。通过分析夏家店上层遗址发掘中得到的这些骨骼可以看到：绵羊/山羊骨骼占绝大多数。猪骨在夏家店下层遗址中占多数，但在上层遗址中有少量存在。马骨在前者中没有发现，在后者的一些遗址中存在。对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动物骨骼的分析与研究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青铜马具在夏家店上层遗址的发现更证明马在当时社会经济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4][25][32]}。

显然，游牧生业方式重要性增加的对社会及物质文化产生直接影响。例如，虽然夏家店上层文化社会并未采取完全游牧的生业方式，但是这一时期定居投入的降低与人畜流动性的增强并存。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资源的变化。为什么人们被迫放弃世代经营的固定农业生产方式而选择了漂泊的游牧生活？

人口的迁徙和气候的改变是解释这个变化的两个主要因素。第一个例子在此地区早期研究中相对较普遍且一直为学者所引用。^{[21][36]}但不幸的是，还没有对两个时期的人类骨骼进行体质人类学和生物学的比较。由于缺乏这种研究，我们只好通过器物并结合文化特征来进行分析，寻求考古序列中文化的突然断裂，而这种文化的突然断裂通常揭示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基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到夏家店上层在物质文化上的一致性，像陶器的形态，或多或少两文化分布地区的重合，现在很多学者多强调两个时期文化的连贯性，当然亦不能排除有外部的影响或有小规模人群的迁入。^[37]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地区大多数人是当地的土著居民。

排除小的分歧，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一地区在公元前 1500 之后资源枯竭化，^{[38][39][40][41]}一些学者认为正是这种原因促使这一地区游牧经济发展以适应环境的变化。^{[42][43]}我个人认为，气候变化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但至少在赤峰地区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因素起到了决定作用。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农耕在赤峰地区不仅在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存在，就是一直到今天还存在。而且在跨越这么长的时间范围内，其中某些时期，如辽代（公元 10—12 世纪），从文献记载可知这一地区也进行过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通过在赤峰地区进行的调查，发现了大量的高密度分布的辽代遗址，亦证实了这一记载。^{[2][3][5]}虽然有些学者指出公元前 1500 年后气候波动较大^{[40][41]}，但同时期在强烈的政治因素的干扰下这一地区存在着繁荣的农业生产，表明气候条件并不是决定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的唯一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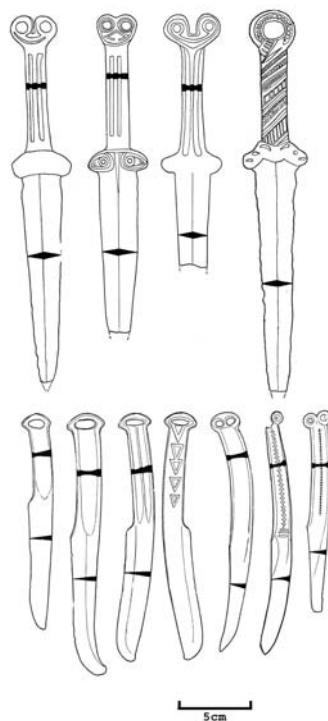
我认为在赤峰地区，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如临近地区，是选择游牧还是农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和政治的因素。当在强大的同一政权领导下常会迫使人们开展密集的农业生产。定居的人群比较容易管理和收税。另一方面，新增加的游牧方式，看起来像是对经济上的机遇和政治上的威胁所作出的反映。人种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例子表明游牧方式是一种有

效的经济和政治策略。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游牧并不能提供人们生活所需的所有产品^{[44][45][46]}，通常他们要与农业社会进行交换，这种交换的形式和程度则有多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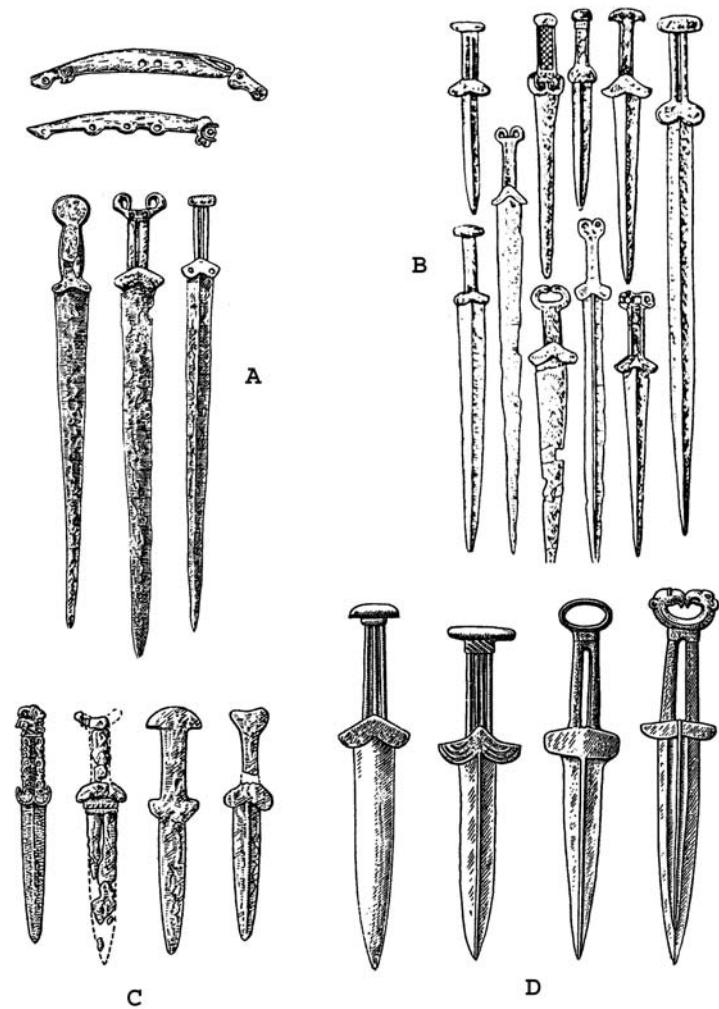
像 Salzman 指出的，大多的游牧社会，即使是高度发达的游牧人群，也从事着不同程度的农业生产。这使得他们在完成从游牧到农耕的转变要比从农耕到游牧的转变相对快得多。这是根据目前所知的情况得出的推论。^[47]在研究中国北方的文化也得出相似的结论。对于一些边远地区来说，游牧相对于农业是一种更好的经济开发方式。^[48]在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在赤峰地区的家畜，是从更西的地区传入赤峰，并在其南部取代了发展的农业，这部分的解释了在这一地区游牧的起源问题。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抵制其周邻地区强大军事压力的一个政治手段。流动性，尤其是联合起来的游牧群体，可作为一种政治抵抗的手段。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这个策略一直被中国邻邦国家所采用。例如，当匈奴对抗强大的中央政权时，流动性一直是他们主要的优势。整个人群的迁徙流动在某些时候是使他们免于被中央王朝控制的唯一出路。^{[49][50][51]}虽然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社会流动性无法与匈奴相媲美，但仍有助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抵制来自南方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压力。

3 地域特色和区间交流

铜器铸造可能是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最具特征、最有发展潜力的产业。铜制品是这个文化最独特的器物。留给现在的观察者最直接的印象是这些青铜器物和北方草原地带出土的同类器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明显的对比是来自中国西北像内蒙古西南部的鄂尔多斯地区的器物。在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域，东起辽宁到内蒙古东部，西到青海和甘肃，可以根据青铜器的不同类型分成几个地区，每个地区都自成体系。^[15]但是，从整体上观察，在器物的形制，艺术主题和整体风格上，这些地区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共性。例如，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刀、匕首和斧头的形制、风格和装饰，几乎与中国东北地区所出的同类器物完全相同（比较图四和十三）。在北方草原地区同时期的文化中也可以找到它们的紧密联系。在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兵器，北与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塔卡尔文化所出相似（图十四，D）西与东南欧的斯基泰文化相似（图十四，A）。相似性还不仅限于兵器，其他器物的类型、风格、技术和原始材料都表现出东西方之间的交流。^{[52][53][54]}如图十五所示，从中国东北到东南欧，从西伯利亚到黑海的广大地域中，古代文化普遍以带有巨大鹿角的公鹿为主题。勿庸置疑，上述东西方之间在器物组合和主题风格上的相似绝非出自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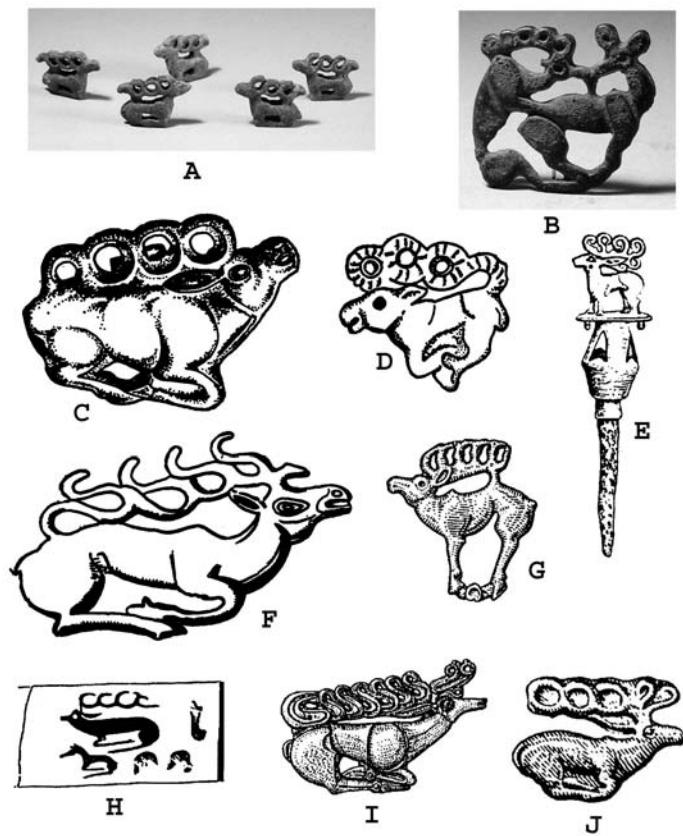


图十三 鄂尔多斯地区的青铜刀与青铜短剑(参见[55]p, p24, p41)



图十四 中亚和东欧草原地区出土的兵器

A组：公元前7—5世纪斯基泰式剑和刀(参见[56]p37, p40)。B组：公元前7—5世纪Sarmatian式兵器。C组：公元前8—6世纪来自帕米尔高原的撒卡式短剑(参见[57]p236)。D组：公元前8—5世纪米努辛斯克盆地塔卡文化的短剑(参见[58]p304)。



图十五 公元前8—6世纪不同地区带有巨大鹿角的公鹿主题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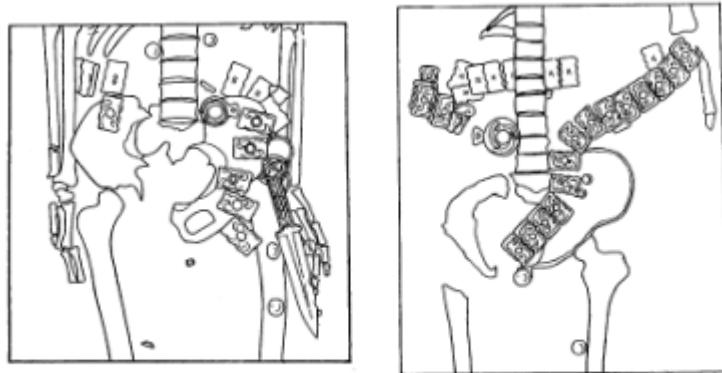
- A: 河北甘子堡青铜牌饰(参见[56]p48)。B: 内蒙古赤峰小黑石沟青铜牌饰(参见[56]p51)。C: 内蒙古西部呼和浩特地区的青铜牌饰(参见[55]p173)。D: 鄂尔多斯青铜牌饰(参见[55]p173)。E: 东南欧的斯基泰青铜柱饰(参见[56]p43)。F: 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青铜牌饰(参见[56]p173)。G: 咸海地区的早期撒卡文化青铜牌饰(参见[57]p222)。H: 南西伯利亚图瓦地区的石雕(参见[57]p272)。I: 北高加索地区的Kostromskaya Kurgan 斯基泰金牌饰(参见[59]p18)。J: 东南欧的斯基泰青铜牌饰(参见[56]p47)。

显然,地区间距离越远,所出青铜器物的相似性就越小,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这一广大地区内青铜制造业的共性大于它们与其南部相邻地区间的相似性。从这些不同区域间出土器物的相似性,可以了解这一地区域内交流的形式和强度。显然,交流在这个时期已经发生并一直进行着。至于谁影响谁、这一影响沿什么方向进行是与当今政治有关的流行课题。⁷我认为,研究地区间交流方式和这一交流在当地社会组织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更有意义。

在这一广大地区内一定存在着一些与观念和设计无关的交换渠道,包括互赠礼物、偶然发生的器物的流通,诸如食物、皮革等大宗的原料贸易也可能占有相当比例。但这些都缺乏考古学的证据,很可能这些物品被当时在该地区移动的人们所携带。重要的是目前在各地区所发现的遗物中外来的输入品只占少数,而本地生产的器物占多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繁荣的青铜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这一结论。

⁷ 不必奇怪,中国考古学者试图证明发现于中国的“北方式”早期遗物起源于东方([54], [67]),而前苏联考古学者则认为起源于俄国。

依据目前已有的资料，我们还不能充分理解这种交流的强度，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北方草原地带普遍出现的“草原风格”。虽然“动物风格”^[60]目前已不流行，但生活在欧亚草原的人们都使用这种非常相似风格的器物，那么在这种风格中一定具有其社会政治的意义。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观察这些青铜器物的功能。通过考古学研究可知其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作为随葬器物。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证明的那样，^[34]这些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与死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密切相关。通过观察这些遗物的形制和在墓葬中的放置方式，我们可以知道它们在死者生前是如何被佩戴使用的。许多遗物有孔或有钩可以缀挂到衣服上，还有一些是带扣或者带饰。许多带有青铜柄或环的小刀和短剑应该是挂在墓主腰间的。这一现象在夏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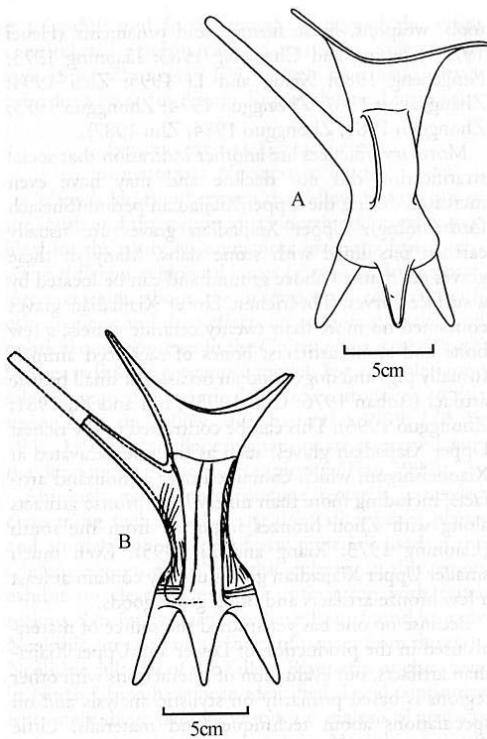
图十六 鄂尔多斯墓葬中所见青铜牌饰和青铜短剑的佩戴方式图示 (参见[55]p244, p248)
店上层文化和鄂尔多斯地区的墓葬中极为明显 (图十六)。

在生前活动和葬礼中使用的北方系青铜器，似乎表明在公元前1千纪生活在欧亚草原地区的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强调区域认同，⁸在中国边疆地区⁹很可能人们有意识地展示他们与南边农业社会的差别。

包括中国东北地区在内的区域交流，显然在公元前2千纪晚期到公元前1千纪早期得到加强。有意思的是，赤峰地区在这一时期同样也是与黄河流域中原政权交流发生变化的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这一地区与黄河流域间并没有隔离，但地区间的交流仍然很有限^[2]。整个公元前2千纪，在中国东北和西北地区，以及包括黄河流域的其南部地区，盛行酋长制组织。每一个这样的组织控制一小片领土，这些组织间的交流往往仅限于随机的交换网络，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存在着行政首长有意识的控制或推动交流。虽然外来器物和原料经常出现于当地不同政治层次的中心点上，但仍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器物扮演了主要的社会政治角色。在当时黄河流域的政治中心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与同时期赤峰地区出土陶器的相似性说明两个地区之间存在交换 (图十七)。然而，在赤峰地区公元前2千纪，外来器物或具有外来因素影响的器物相对少见。事实上，各个文化中的器物均产自本地，并且必然反映了当地的风格，例如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陶，就是其典型器物。

⁸ 这与他们在彼此之间的交流中展示土著身份并不矛盾。

⁹ 本文没有定义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存在，是由于当时中国与中国人的概念还没有被用于此地，而是被广泛运用于长江黄河流域及其临近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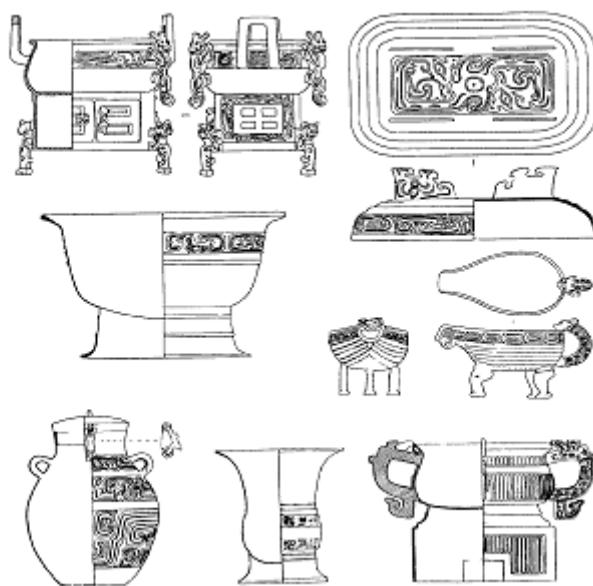


图十七 大甸子与二里头出土的陶爵 (A. 参见[33]p84, B. 参见[61]p136)

晚商时期（公元前 1300–1050）在当时商王朝的中心地区殷墟就发现了“北方式”器物。虽然这些不同于典型商式铜器的器物来源尚未经过科学检测，但是它们的独特风格已能说明其来自东北地区。到西周时期（公元前 1050–771）典型的北方式青铜器被随葬于中原地区的墓葬中，中原式器物也被随葬于北方地区的墓葬中。商和西周的青铜容器被发现散布于整个中国东北地区^{[62][63]}。一些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中随葬的青铜容器和兵器，在风格、制造技术上与中原地区的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同类器物相似^{[19][20][21][26]}，而与本地同类器物迥异

（图十八）。虽然还没有化学成分检测证实这些青铜容器和兵器是出自于中原地区，但是它们的形态、风格和制造技术都表明他们是在中原的某一地区制造的。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小黑石沟发掘的一座等级较高的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簋的铭文证实了这一假设。该铭文记载，此簋来自位于今河南省境内的徐国^[19]（图十九）。¹⁰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墓葬中发现的所有中原地区的典型青铜容器和部分中原式兵器，表明当时的中原地区一定存在着与位于其东北部的周边地区进行交流的通道。

¹⁰ 15 个字的铭文说明这件容器是姜姓的徐国人为其子孙所作。根据文献，徐国是西周初年（公元前 11 世纪）被封于此地的姜姓贵族所建。到公元前 6 世纪，徐国几次迁徙，但均在今河南境内。最终在战国时期被楚国所灭（另一说被魏国所灭）（参见[67]p170-174）。此铭文说明这件簋曾在距出土土地数千里以南的地方被制造并使用。铭文似乎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这一墓葬墓主无关。此外，即使该墓主能够读懂这篇铭文，但是铭文内容对他们如何使用这件簋是否有影响还是个令人怀疑的问题。



图十八 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中发现的“中原式”青铜器（参见[19]p8, p19）。



图十九 内蒙古赤峰地区小黑石沟遗址出土的青铜容器之铭文(参见[19]p10)。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些中原式青铜器仅出自比较富裕的墓葬。在表4所统计的81座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中，两个最富有的墓葬共出土了30件中原式青铜器，而整个墓地一共才出土了33件中国原式青铜器。同一分析结果还表明除了那些最贫穷的墓葬，草原风格的青铜器发现于所有的墓葬，而输入的中原式青铜器和当地生产的青铜器则仅见于那些重要人物的墓

葬。这意味着同时并行着两个表征体系。欧亚草原青铜器，以及在当地生产的青铜器或者从其他地区输入的青铜器，被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使用，并在死后随葬到自己的墓葬中。地位高的人拥有大量的上述器物，这些器物都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似乎象征着拥有者所具有的政治地位，并表明与欧亚草原具有相同的共性。

表四 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分类

	无随葬品的墓	没有大型青铜器 但有其他随葬品 的墓	随葬 1—11 件大 型青铜器的墓	随葬 11 件以上 大型青铜器的墓
墓葬数量	5	26	48	2
平均墓葬面积 (m ²)	0.75	1.36	1.68	7.75
平均墓葬深度	0.39	0.71	0.76	2.25
木棺比例 (%)	20%	23%	36%	100%
石棺比例 (%)	0%	8%	21%	100%
随葬品总数的平 均数量	0	59	225	563
随葬铜制品的平 均数量	0	39	39	510
随葬青铜容器的 平均数量	0	0	0.02 (1) ¹¹	23 (46)
随葬中原式青铜 器的平均数量	0	0	0.06 (3)	15 (30)

中原式青铜器和受中原地区影响而在当地生产的青铜容器，似乎具有象征权力的意义。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青铜器在墓主人生前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作为随葬品，它们不仅表明墓主人具有对外交流的能力，也代表着他们拥有控制当地大规模铜器生产的能力。也许这些中原式铜器所具有的意义是因为它们是战利品，或者只是因为这些器物与其他器物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

4 结论：向牧业生活转变的影响和区域间交流的变化

向牧业生活过渡，区域间交流加强，出现欧亚草原风格的青铜器，是同一发展过程中的三个方面。如同鸡和蛋的问题一样，与其讨论哪一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最先发生，不如讨论哪些方面彼此关系更为密切更有意义。

居住在草原地带的人们之间，以及这些人群和他们南面的邻居之间的交流使得他们的产品和观念得以迅速传播，更专业的牧业生活可以看成是对草原地区与其他地区间出现的这种贸易机遇所作出的反应。另一方面，为适应日渐频繁的文化交流亦可视为发展游牧的一个重

¹¹括号内的数字是发现遗物总数

要动机，由于这种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日渐增强的流动性和促进了交通设施的改进就是其中的两个因素。

同样，通过可移动的铜器象征的草原认同性和共同的艺术风格的出现，表明向游牧生活的转变以及欧亚草原上的社会交流日趋频繁。夏家店上层文化铜器制品上的动物图案反映了动物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动物是家畜和食肉动物的生活资源，这些现象在夏家店上层文化艺术品和草原文化中都有反映。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及上面提到的原因，是对铜器铸造风格和技术相对趋同的唯一解释。

另一方面，草原艺术和所有的艺术一样，不但反映生活的条件，同时还具有多重意义。它可看成是一股积极的力量促使游牧生活方式从一种并非肯定是优越的经济方式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和动物密切相关，强调游牧而非农业，这也许和欧亚草原内的区间交流的自然特性息息相关。像上面指出的一样，游牧和它的艺术及意识形态可看成是他们抵御中原政权压力的一种方式。这种意识形态，建立在对中原式生活方式抵制的基础上，强调了他们本土的文化特性，这就解释了为何当地不同阶层的人们都随葬有随身使用的铜制品。尽管其中的一些器物，如刀和带扣等是实用器，但这些器物更主要的功能是作为本土同一性的象征。

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生的所有这些变化，看来都没有影响到社会的复杂性和政治的完整性。与一些考古学家的观点相反，这一地区在夏家店下层时期社会和经济的阶层并没有出现衰退的迹象。另一方面，这一地区也没有出现同时期的可和中原政权相媲美的国家级政权或任何形式的地方性政治实体。虽然各阶层并未发生变化，但反映社会关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用属于公共的和属于家庭的建筑来表示，而夏家店上层文化则以日常生活中使用，死后埋入墓葬的可移动的铜制器来表示。

这个变化无疑是与以牧业为主的经济方式有关。从事牧业方式的群体较少使用固定建筑。这同样也影响到意识形态的变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领导者有着群体意识，他们负责管理着大规模的防御工事和其他公共事务。在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领导者的作用比较个人化了。富有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就是显著的例子，在这个社会里政治权利仅与领导者个人或上层社会阶层有关，而不是通过执行公众事务而成为领导。^{[2][34]}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从南方的中原政权获得的“外来品”拥有了一个重要的合法地位。因为本地生产的青铜器被社会各阶层广泛使用，所以拥有中原式青铜容器比拥有大量的当地器物会显得更有身份和威望。虽然我们无从知道这些器物如何到达东北地区，是贸易还是作为礼物交换，或是暴力如战争或袭击取得。看起来好像交流的渠道被当地首领所控制和管辖。和欧亚草原其他人群的交往看起来更频繁、更具有经济上的价值，但和中原政权的交流则更具有社会政治意义。

这次研究得到了以色列科学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授予第 839/01-1）。早期论文的翻译本在 R. Amitai and M. Biran, eds. *Mongols, Turks and Others: Eurasian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Brill, Leiden. 出版。

参考文献

- [1] Shelach, G. 中国东北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最新发现和农业起源研究的新前景 [J]. 世界史前史期刊, 2000, 363-413。
- [2] Shelach, G. 中国东北地区复杂社会的领导策略、经济活动和区域间交流 [A], 纽约, 1999。
- [3] 赤峰联合考古调查队. 内蒙古赤峰地区 1999 年区域性考古调查报告 [J]. 考古, 2003, (5): 24-34。

- [4]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 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R]. 北京, 2003.
- [5] Linduff, K.M., R. Drennan, and G. Shelach. 中国东北早期部落联盟: 赤峰国际联合调查项目[A]. 田野考古期刊[C]. 2004, 45-73.
- [6] 徐光冀. 赤峰英金河, 阴河流域的石城遗址[A]. 中国考古学研究[C]. 北京, 1986, 82-93.
- [7] 郭大顺. 夏家店下层文化[A]. 中国东北考古学[C]. ed. S. M. Nelson. 伦敦与纽约, 1995b, 147-81.
- [8] 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 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 1972 年春发掘简报[J]. 考古, 1976, (3): 197-210.
- [9] 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J]. 文物, 1977, (12): 1-15.
- [1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赤峰药王庙, 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74, (1): 111-144.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J]. 考古学报, 1979, (2): 215-244.
- [12] 田广金. 内蒙古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2, (1-2): 1-20.
- [1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工作队. 敖汉旗大甸子一至 1974 年试掘简报 [J]. 考古, 1975, (2): 99-108.
- [1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阜新平顶山石城址发掘报告[J]. 考古, 1992, (5): 399-417.
- [15] 林嘉琳. 亚瑟收藏的欧亚大草原东部古代青铜器综述[A]. ed. E. C. Bunker, 纽约, 1997, 18-98.
- [16] 林嘉琳. 草原周边地区青铜制造文化的出现和消亡之研究现状与展望[J]. 史语所集刊, 1997, (4): 393-428.
- [17] 河北省博物馆. 河北平泉东南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J]. 考古, 1977, (1): 51-55.
- [18] 建平县文化馆, 朝阳地区博物馆. 辽宁建平县的青铜时代墓葬及相关遗物[J]. 考古, 1983, (8): 679-694.
- [19] 项春松, 李义. 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J]. 文物, 1995, (5): 4-22.
- [20] 翟德芳. 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A]. 李逸友, 魏坚.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C]. 北京, 1994, 296-316.
- [21] 朱永刚.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A]. 苏秉琦. 考古学文化论集[C]. 北京, 1987, 99-128.
-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 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 102 号 石椁墓[J]. 考古, 1981, (4): 304-308.
-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J]. 考古, 1984, (5): 417-426.
- [24] 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 河北宣化县小白杨墓地发掘报告[J]. 文物, 1987, (5): 41-51.
- [25] 宁城县文化馆. 宁城县新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及其相关遗物的研究[J]. 文物资料丛刊, 1985, (9): 23-58.
- [26] 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 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J]. 考古学报, 1973, (2): 27-38.
- [27] 辽阳市文物管理所. 辽阳二道河子石棺墓[J]. 考古, 1977, (5): 302-305.
- [28]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辽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 1976 年试掘简报[J]. 文物资料丛刊, 1983, (7): 138-146.

- [29] 王刚. 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4, (1): 45-50。
- [30] 安志敏. 唐山石棺墓及其相关的遗物[J]. 考古学报, 1954, (7): 77-86。
- [31] 敦汉旗大甸子公社历史研究小组. 从大甸子等地出土文物看历史上的阶级分化[J]. 文物, 1976, (1): 79-84。
- [32] 刘观民, 徐光冀. 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两种文化[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81, (1): 5-14。
-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R]. 北京, 1996。
- [34] Shelach, G. 苹果还是桔子? 中国东北地区墓葬数量的交叉比较研究[J]. 东亚考古学期刊, 2001, 53-90。
-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75, (1): 117-140。
- [36] 田广金. 内蒙古长城地带诸考古学文化与邻境同期文化相互影响规律的研究[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3, (1-2): 16-22。
- [37] Di Cosmo, N. 古代中国及其敌国: 东亚历史上游牧民族势力的强大[M]. 剑桥, 2002。
- [38] 孔昭宸, 杜乃秋, 刘观民, 杨虎.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距今8000—2400年间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A]. 环境考古研究[C]. 北京, 1991. 112-119。
- [39] 李文漪, 梁玉莲. 河北东部全新世温暖期植被与环境[J]. 植物学报, 1985, 640-651。
- [40] 史培军. 地理环境演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1991。
- [41] 杨志荣, 索秀芬.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南部环境考古研究[A]. 周昆叔, 宋豫秦. 环境考古研究[C]. 北京, 2000, 81-88。
- [42] 刘观民. 西拉木伦河流域不同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域的变迁[A]. 苏秉琦. 考古学文化论集[C]. 北京, 1987, 48-57。
- [43] 乔晓勤. 关于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探讨[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2, (1-2): 21-25。
- [44] Cribb, R. 考古发现的游牧部落[M]. 剑桥, 1991。
- [45] Khazanov, A.M. 游牧部落及其外部世界[M]. 剑桥, 1983。
- [46] Lees, S.H. and D.G. Bates. 游牧起源系统模式研究[J]. 美洲古生物学, 1974, 187-193。
- [47] Di Cosmo, N. 古代中亚游牧部落: 它们的经济基础及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影响[J]. 亚洲研究期刊, 1994, 1092-1126。
- [48] Gilbert, A.S. 伊朗西部游牧起源研究[A]. 世界考古学[C]. 1983, 105-18。
- [49] 宾福德. 匈奴部落联盟: 组织与对外政策[J]. 亚洲研究期刊, 1981, 45-61。
- [50] 宾福德. 危险的边境: 草原帝国与中国[J]. 牛津, 1989。
- [51] Jagchid, S. and Symons, V.J. 长城地带的和平、战争和贸易[M]. Bloomington, 1989。
- [52] Bunker, E.C. 亚洲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文化差异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A]. ed. V.H. Mair, 华盛顿与费城, 1998. 604-618。
- [53] Wagner, D.B. 中国铁器的早期应用[A]. In *Metals in antiquity*, eds. Suzanne M. M. Young, A. Mark Pollard, Paul Budd, and Robert A., 牛津, 1999, 1-9。
- [54] 乌恩. 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J]. 考古学报, 2002, (4): 437-470。

- [55] 田广金, 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北京, 1986。
- [56] Melyukova, A.I.早期铁器时代在欧亚草原游牧的西伯利亚斯基泰人[A]. eds. J. Davis-Kimbal, V.A. Bashilov, and L.T. Yablonsky. Berkeley, 1995 年, 27-62。
- [57] Yablonsky, L.T.中亚的萨卡: 早期铁器时代欧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A]. eds. J. Davis-Kimbal, V.A. Bashilov, and L.T. Yablonsky. Berkeley, 1995 年, 198-252。
- [58] Bokovenko, N.A. 西伯利亚的斯基泰文化[A]. 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的游牧文化[C]. eds. J. Davis-Kimbal, V.A. Bashilov, and L.T. Yablonsky. Berkeley, 1995, 253-314。
- [59] Petrenko, V.G. 欧亚大草原早期铁器时代的游牧部落: 北高加索的斯基泰文化[A]. eds. J. Davis-Kimbal, V.A. Bashilov, and L.T. Yablonsky. Berkeley, 1995, 5-26。
- [60] Bunker E.C., Chatwin, C.B., and Farkas, A.R.从东方到西方动物纹样风格艺术[M]. 纽约, 1970。
- [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僮师二里头 1959 年-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R]. 北京, 1999。
- [62] 喀左县文物馆. 辽宁省喀左县山湾子出土殷周青铜器[J]. 文物, 1977, (12) : 23-33。
- [63] 苏赫. 从昭盟发现的大型青铜器试论北方的早期青铜文化[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82, (2) : 1-5。
- [64]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辽宁建平县喀喇沁河东遗址试掘简报[J]. 考古, 1983, (11) : 973-981。
- [65] 李延祥, 韩汝玢, 宝文博, 陈铁梅. 牛河梁冶铜炉壁残片研究[J]. 文物, 1999, (12) : 44-51。
- [6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75, (1) : 117-140。
- [67] 乌恩. 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J]. 考古学报, 1985, (2) , 135-156。
- [68] 中国历史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东南部航空摄影考古报告[R]. 北京, 2002。

The Rise of Pastoral Adapt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Local Processes and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s

Gideon Shelach

(Dept. of East Asian Studies The Hebrew University 91905 Israel)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wo phenomenon: 1. Local social and economic processes which took place on the northeastern borders of China and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in this region, of pastoral adaptation. 2. Intensification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his region and areas in the steppe-lands of central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and with areas to its south in present day China. While those are seemingly unrelated processes I argue that they are both integral parts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which resulted i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real and symbolic dichotomy between the “the steppe and the sown” and shaped the geopolitical landscape of the region for the next 2500 years. Only by addressing those two processes together we can hope to gain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roader picture.

Key words: pastoral; Northeast China;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s; Eurasian Steppes

收稿日期: 2004-10-27

作者简介: Gideon Shelach (1959—), Dept. of East Asian Studies The Hebrew University